

FORESIGHTED LEADING

一个真正的成功体制，政府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基础、机制和规则来超前引领，用有形之手去填补市场无形之手带来的缺陷和空白。

超前 引领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陈云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ORESIGHTED LEADING

一个真正的成功体制，政府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基础、机制和规则来超前引领，用有形之手去填补市场无形之手带来的缺陷和空白。

超前 引领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陈云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陈云贤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 - 7 - 301 - 18359 - 5

I . ①超… II . ①陈… III . ①地区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426 号

书 名: 超前引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著作责任者: 陈云贤 著

责任编辑: 马 霄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8359 - 5/F · 269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cn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31 千字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序

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在世界经济领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我之所以一直坚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一说,而不采用业内和业外普遍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一词,道理很简单:模式是僵化的。模式僵化和教条主义贻害的是探索的勇气,阻遏的是进取的脚步。而这是最为致命的,因为中国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得依靠结合实际的摸索。前 30 年的改革开放如此,眼下的经济转型也不例外。

就经济理论而言,缺的并非貌似高屋建瓴的宏论和如水月镜花般的夸夸其谈,而是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的、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以及脚踏实地的经济理念。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做出了成绩,展望今后,21 世纪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继续有所贡献的世纪。陈云贤博士就属潜心于经济发展主战场而始终不忘理论思考的经济学家之列。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焦点是在政府行为上,即对政府职能的界定上。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有关政府职能的观念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改革,比如政府无所不能、政府应当支配一切、凡是政府能做的都应由政府来做等。这种观念无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做的,就是界定政府的职能和功效。在当下的经济转型中,能否从政府行为的传统思维中抽身,继而更加前瞻地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作为,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我曾多次指出,中国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泡沫怪圈,政府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后调节”的地位,而必须采取“事前调节”的措施,建立预警机制。陈云贤博士的政府超前引领理论,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全国正在推进的转型发展,我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



发展的条件,而在这一体制调整过程中,最为关键也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而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因此,我始终强调必须重新构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陈云贤博士在本书中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的职能不仅有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还包括协调促进引领经济发展的职能。地方政府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代表了市场经济微观的层面,另一方面代表了国家政府宏观引领调控促进经济发展。我认为他提出把政府也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观点,十分重要。

我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中指出,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调节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地说,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有效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调节经济的目标,不是限制企业的活力,也不是限制市场的活力,而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总之,政府调节的目的是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两者不至脱节,并且,政府调节不能滞后,不能仅限于“事后调节”。陈云贤博士所提的“超前引领”正是为了避免“事后调节”而进行的“事前调节”,让政府用“有形之手”去填补市场“无形之手”的缺陷和空白。他提出,如果说“企业”代表微观经济,“国家”代表宏观经济,那么“区域”就代表中观经济。我认为,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探索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读完本书初稿后,我希望陈云贤博士通过在改革开放先行地区顺德的

实践所总结出的政府超前引领理念,以及如今正在推行的“四化融合,智慧佛山”理念,能在他主政的佛山全市推广并结出硕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此外,有着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陈云贤博士,在本书中对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多有论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同样值得期待。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我经常提到,中国计划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二元体制,而改革 30 年来,所改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而对于城乡二元体制,前 30 年基本没有触动。作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前沿阵地,佛山有着内地城市无法企及的优越,无论城乡二元体制理论的探索还是实践,都有可能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

我很高兴地看到《超前引领》一书的出版。我想,这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对于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陈云贤

前　　言

南方以南有片云帆，
我要到南方以南闯荡，
我的命运会在南方以南改变。

这是一首名叫《南方以南》歌中的几句歌词。南方以南，自然是指广东。念着这几句歌词，让人由生一种感慨。转眼间，我南下广东已近 20 年。时常在晚间，行走在广佛路上，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绚烂霓虹，让人思绪万千。有时甚至想冲进夜色，拥抱这片土地，仰望这片星空。

1991 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广州，当时我是广东发展银行引进的第一个博士。在北大时，我的导师萧灼基教授是中国较早从事证券市场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我的博士论文是《中外证券投资比较研究》，研究比较美、英、德、日四国证券市场的运作并借鉴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中。论文发表后，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中外证券投资比较研究的先河，填补了我国证券投资领域的空白。

由于这种学术背景，广东发展银行让我筹建证券业务部。我们从 6 个人、200 多万元现金起步，在广州和珠三角的城市间奔走。筚路蓝缕，从广东发展银行证券业务部，到创立广东广发证券公司，又改制为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从一个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证券部成长为全国性大型证券公司，全国各地和海外的 65 名博士和 385 名硕士集中在广发证券，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令人瞩目的“博士军团”。到我离开的时候，广发证券已成为拥有 1900 多名员工、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和管理着近 80 家分支机构的大型综合类券商。公司的总资产达到 230 多亿元，净资产超过 25 亿元。

2003 年年初，广东省委调我到佛山市，担任佛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这样，我一下子由从商转为从政，从微观经济领域到了中观经济领域。由学而商，再由商而政，我的人生多了历练和机会。



2004年，组织上又让我兼任顺德区委书记，2006年再回到佛山市担任市长，2010年开始担任佛山市市委书记。佛山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顺德是广东的改革先锋，能在这片改革热土上工作是我的荣幸。

置身于充满改革和创新精神的土地上，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我也经常学习和思考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问题。走出校门以后，我的理论思考并没有停止，而且更多地基于实践来思考理论问题。因为我坚信，脚踏实地者最能感知到土地的坚实。

到地方工作后，我思考最多的是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而且我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进行思考。像佛山和顺德这样的中国先发地区，其走过的路和未来呈现的方向，确实为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和机理。

在顺德工作的时候，对顺德产业发展的研究和思考，让我深深地感悟到，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应该进入超前引领的阶段了。在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时候，我们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就需要对发展进行引领、规划，实施推进。

本书是我从政多年来的思想火花，是平时学习的积累，是对实践的思考。今天把它“采集”成书，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区域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关注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手段和方向。

作为领导干部，常为日常繁杂的事务所困，但我依然能感受学习的重要。胡锦涛总书记说，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说，放弃学习，就是放弃了进步；选择学习，就是选择了明天；抓紧学习，就是抓住了未来。少一些浮躁

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少一些吃喝玩乐，多一些知识文化；少一些投机钻营，多一些真才实学。我们的党员干部要自觉学习、善于学习，学有所得、学以致用。人人有学习动力，处处有思想活力，社会才有文化魅力，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发展才有持续的竞争力。

我们已经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已经彻底打破了对物质资源消耗的绝对依赖，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创新变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可以说，“知识经济”归根结底是依靠“智慧”的经济，是“创新”的经济，而“智慧”和“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智慧，要靠人来创新。一个人要具备创新能力，没有长期的学习作为支撑，是无法实现的。

目录

Contents

序 / 厉以宁 001

前言 / 005

引言 超前引领：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 / 001

探寻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体系 / 003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 004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 006

中观经济学视野下的政府职能 / 008

从做“保姆”到做“向导” / 010

第1章 顺德新政：超前引领是最好的服务 / 013

破解先发地区产业升级的难题 / 015

“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 / 017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超前引领 / 019

五大配套机制实施“三三三” / 025

协调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 028

支柱行业和龙头企业双提升 / 030

企业发展的“五阶段” / 033

工业化，顺德制造代表中国民族工业方向 / 035

城市化，顺德站在更高发展平台 / 038



国际化,引领顺德超前发展新动力 / 041

第 2 章 智慧佛山: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融合之道 / 045

四化融合,智慧佛山 / 047

工业化转轨,城市化加速,国际化提升 / 052

智慧佛山,文化先行 / 057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佛山之路” / 063

把握所处发展阶段选择转型路径 / 067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 078

思维方式转变和知识转型 / 086

实施商标战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 090

第 3 章 敢为人先:中国先发地区的道路和方向 / 097

经营城市,把城市作为一种资源来管理 / 099

慎用传统银行思维调控现代金融发展 / 103

金融海啸中佛山突围的“秘诀” / 109

积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 116

光电产业,佛山产业新军 / 118

以金融创新实现“困境突围” / 121

佛山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显雏形 / 124

中国三旧改造“佛山经验” / 128

“较大的市”,先发地区的“成长烦恼” / 131

广佛同城,珠三角一体化的点睛之笔 / 134

赴香港地区考察心得体会 / 137

第 4 章 媒体对话:让资本之光照耀产业高地 / 147

CCTV2《对话》栏目:佛山是一只响当当的蓝筹股 / 149

《广州日报》:知识经济要靠看不见的脑 / 153

《中国证券报》:以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中国创造” / 157

《21世纪经济报道》：扩大工业品下乡促进内需 / 164
《南方日报》：引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 167
《佛山日报》：佛山“金融岩浆”一触即发 / 171
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用好政策机遇，努力谋求突围 / 175
2009达沃斯一：海啸下佛山企业数量反而增加 / 189
2009达沃斯二：揭秘中小企业的重振 / 193
2009达沃斯三：绿色和环保对中小企业也非常重要 / 195
第5章 网络问政：务虚要脚踏实地，务实要高屋建瓴 / 197
市长问计网民：假如你是市长 / 199
书记与四万网友互动：“我把网友当政协委员” / 208
第6章 一家之言：“先看两步，先行一步” / 217
难忘广发证券创始人陈云贤 / 219
弃商从政，广发证券陈云贤悠然“上岸” / 222
超前思维引领跨越发展 / 226
温暖、好学、高知的陈云贤 / 233
跋 / 萧灼基 235

引 [言] 超前引领：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理论创新



探寻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体系

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说过:“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名师辈出、大师级的人物引导世界经济学科发展潮流的世纪。”

林毅夫教授是在总结归纳世界经济学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们知道,理论是解释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林毅夫教授认为,从逻辑体系来讲,很难说一套逻辑体系比另外一套逻辑体系更重要。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一些人的理论是大师级的理论,而一些人的理论就不那么重要?他认为关键在于理论所解释的现象是否重要。如果一套逻辑理论体系解释的现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现象,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级的大师。

那么如何来判断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呢?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现象的重要性依赖于这种现象所发生的国家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经济大师的产生地的转移,反映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管是马列主义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都集中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集中在美国,个中原因就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回到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发展和中国形象,必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所取得的成就,将是世界级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持续发展,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似乎



很难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于是有西方经济学家说，谁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奖。

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中国不仅创造了过去 30 年的奇迹，也已经显露出了未来 30 年的美好端倪。这种存在，呼唤着我们经济学人对中国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呼唤着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作为一个身处实践领域的经济学家，能参与、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过程，实乃三生有幸。

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是与实践最为紧密联系的学科之一。对经济学的研究，我更愿意从实践中对现象进行理论提升，再把理论服务于实践，同时也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中国发展的现在和未来在我眼前愈发清晰。

我用四个字来概括：超前引领。

我认为超前引领是表达政府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套很好的逻辑体系。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经济学能真正成为一门学科，主要是因为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认为，看上去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亚当·斯密主张自由从事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安宁，投资于某些纯属公共利益的事业。

相信市场，亚当·斯密这种自由经济理论很快被社会普遍接受，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带来了英国的繁荣。甚至有人认为，亚当·斯密对英国的影响仅次于牛顿。

在出版《国富论》后的 12 年间，亚当·斯密的行政职务仅是一个普遍的海关官员。一天，他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来客都是那些几乎掌握

了英国经济命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亚当·斯密下了马车，一进门，大家都起立欢迎，站着不动。亚当·斯密请他们坐下，英国当时的首相皮特说：“不，你坐下来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可见亚当·斯密在英国的影响和地位。

然而，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的基本看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导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经济的周期性巨大震荡，带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

在西方世界遭遇经济危机的“水深火热”之时，当时的苏联却是“风景这边独好”。他们创造了一种名为“计划经济”的经济社会管理新模式。苏联从1928年到1932年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国家一派欣欣向荣。而此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时期，苏联的成功引起了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美国人，也开始尝试着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时，又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登场了。

凯恩斯认为，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是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以确保足够的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凯恩斯推动了西方国家经济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的基本看法。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很快风靡西方经济学界，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一大经济学流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凯恩斯主义”作为长期奉行的“国策”，依靠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影响经济。“凯恩斯主义”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以至于有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